

本刊「二十一世紀評論」專欄歡迎海內外作者，就中國司法改革的前景，撰文討論。

——編者

## 近代日本思想演變與中日關係

周頌倫〈文明「入歐」與政治「脫亞」——福澤諭吉「文明論」的邏輯構造〉（《二十一世紀》2014年4月號）以日本明治時期的社會思潮和福澤諭吉的相關論述作為切入點，分析了近代日本「脫亞入歐」意識的形成過程，即先有文明層面的「入歐」，後有政治層面的「脫亞」，而中日兩國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強化了日本的危機意識，成為推動「脫亞論」形成的時代因素。

「政治脫亞論」固然構成近代日本對華政策的重要思想底色，但其內部思想仍有更多值得注意的面相。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黃白種爭」思潮的影響和因應歐美列強擴張的現實壓力下，中日兩國在甲午戰爭後的緊張關係逐漸緩和，並在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內密切合作，出現了近代中日關係史上難得的「黃金十年」。儘管日本仍然以「黃白種爭」中「黃種」的領導者自居，中日兩國之地位難言平等，但這說明在面對「西方」這一共同「他者」的挑戰時，中日之間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合作可能。對於近代以來的日本而言，在「脫亞入歐」、認同西方「文明」的道路之外，也存在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着反思西方現代性、回歸亞洲的思想脈絡，二者之碰撞和糾纏即構成更為深刻的思想命題，即「近代的超克」。近代日本思想邏輯構造的矛盾性，使得其對外政策充滿了內在緊張，也會繼續影響到未來中日關係的走向。

趙崢 上海  
2014.4.28

## 日本極端民族主義之背後

呂玉新的〈文明史鑒：日本國學影響下的極端民族主義濫觴〉（《二十一世紀》2014年4月號）一文，探討日本近代尤其是戰後激進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之言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二戰罪責未被徹底清算，二是以神國神民為論調的日本近代國學的鼓吹、煽動以及其影響的根深蒂固。

觀其源起，日本古學鑒於中國的諸子之學，其斥宋明理學之虛，尋究先秦原典之實，但此時並沒有明顯的種族優劣色彩。看其變質，日本古學流變為以神國神民為基調的國學，關鍵之處在於古學和神道學的契合，繼而片面放大了神道觀。當日本自秉為神民的輿

論一經產生，其民眾內心的優越感就會頓然膨發，種族主義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日本近代國學賴以為基的神道之學，也是源起於中國老莊的道家文化，然而中國和日本的神道之學，為何對後世影響的差異如此巨大？中國的國學裏，道教只是一個方面，人們對神明尊崇備至，燒香祈福，君主一人稱天子，百姓稱黎民；日本國學的神道教色彩濃厚，以神命自居，君主一人稱天皇，百姓稱神民。這或許與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有關：海洋一隅，位置上的自卑；小國寡民，疆域上的自卑；長期處於東亞封貢體系之內，歷史上的自卑；黑船來襲、被武力叩關，在異邦人堅船利炮面前的自卑。而愈是這些客觀上的自卑，就愈需要某些主觀上的自命不凡來消除，於是神道觀被發揮到了極致。而此時的中國仍然是以天朝上邦自居，所以神道之學只能成為小民小眾求福保平安的祈願之物。

呂文在條述日本國學源流時，結合了中國；談起流變時，結合了西歐乃至全球，從而潛在地表明，日本的國學是在全球化起步的大背景下，以諸子之學為正源，片面放大神

道觀，又融合世界思潮的複合產物。其實質和初衷是日本面對近代風雲突變的國際環境為其政治行動所做的一種輿論渲染。「任何一個國家，被具有極端意識形態思想的政治人牽引，將國家導向與鄰為敵之路，都是歷史的悲哀，文明的倒退。」文末的點睛之筆，在中日關係緊張的今天，更是發人深省！

隋樹坤 南京  
2014.5.5

## 隔膜還是溝通：中日兩國該如何認識中日戰爭？

李朝津的〈中日戰爭與歷史反思〉（《二十一世紀》2014年4月號）一文，詳細闡釋了中日兩國對於中日戰爭的爭議。正如李文所說，無論台灣還是中國大陸學界，對中日戰爭的解釋仍未能超越出救亡圖存的角度，因此海峽兩岸至今缺乏一個宏觀解釋。

中國學者普遍把中日戰爭看成是近代日本的一個連續侵略過程；而日本不少學者採取的是不連續觀點，認為中日戰爭是有許多轉折點的。其實兩者的爭議，最終都是指向戰爭責任這個問題上的：「戰爭連續說」希望由宏觀角度追究出一個最後責任的真相，「戰爭不連續說」則不認為戰爭責任是一個歷史研究的中心課題，兩者的差別造成不斷的紛爭。

李文指出：戰爭責任，一是道德層面上的；一是法律層面上的；二者都無法幫助思考歷史；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只能由歷史事件的關聯性着手。強調歷史的關聯性，就是

要把握歷史時代裏的大方向，儘管個別歷史事件都有不同的因素，然而忽視歷史大方向，則無法整合不同的歷史事件。以「九一八事變」為例，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也不是過去中國學者強調的是日本蓄謀已久的，大致可以確定是偶然事件；之所以擴大成為全面戰爭，也不是淞滬戰爭的發生，而是日本誤解蔣介石開戰之決心。還有就是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也有關聯性，不能割裂。

反思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可以發現中日戰爭和二戰是有關聯性的。二戰時日本作為後起國家，實行富國強兵政策是主權國家競爭的必由之路；日本企圖改變國際現狀，是中日戰爭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中日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以及美國在中日關係中的傾向性問題，都是這場戰爭擴大的因素。

中日戰爭應置於二戰的世界背景上，才能理解其發生的真正原因。另外，消弭意識形態的衝突，對於維護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平，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多從正面去思考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教訓，而不是喚起彼此之間的仇恨，是人心教育應該重視的內容。

徐志德 南京  
2014.4.24

## 網民政治立場的可能性

西方學界中對中國網民和互聯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聯網與政府之間的張力上。關於中國網絡是否具有強大社

會轉變、解放的潛力，一直是個熱點話題。馬得勇、張曙霞的〈中國網民的「左」與「右」〉（《二十一世紀》2014年4月號）一文，以實證方法對網民的「左」、「右」政治立場進行了研究，嘗試概述龐大的網絡主體面貌。該文擺脫僅從知識份子和精英上層角度觀察的單一視覺，補充了網民的大眾角度。

該文引發了幾個值得作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撇除一些關於網絡調查的可靠性、樣本大小及其是否具有代表性等技術性問題，首先，網絡是否能真實反映出網民政治態度的一種媒介？真正的政治態度除了體現在對某些事情的是非判斷之上，更多從行動抉擇等具體語境中體現出來，而這個層面恰恰是無法從網絡世界中得到反映的。另外，筆者較為關注大學生的政治立場。由於大學生階層對文革、改革等歷史事件的經歷和親歷者不同，擁有的社會資源和地位不同，會否導致問卷的一些指標（例如對毛澤東的態度、對改革的看法等）對於年輕階層的「左」與「右」的判斷並不適用？所調查的網站也並沒有包括大學生較為集中的輿論網絡（如豆瓣網）。最後，網民「左」與「右」的傾向與網民「犬儒」趨勢之間的關係如何，也值得進一步深思，後者對網民的真實政治態度具有深入的影響，同時對於界定網絡虛擬世界的「左」與「右」劃分的基礎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孔銳才 新西蘭  
2014.4.28